

新时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冯宪光

摘要: 习近平关于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首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这就是说研究的重点在他们的成果上,就其成果交流对话,对他们的理论成果进行鉴别和分析,有什么可以吸取,有什么应该排斥,而不是去辨别这些人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次,要着重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特点,在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对其文化研究、话语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成果进行分析,以推进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与发展。

关键词: 新时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 交流对话

DOI:10.13760/b.cnki.csalt.2019.0034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我们在新时代,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潮,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十九大召开前夕,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在9月29日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②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论述。这个论述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客观存在的事实，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同时阐明了它的主要特点以及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原则、方法。习近平的讲话指出了当前国内研究的弊端。一方面是“一概排斥”，另一方面是“全盘照搬”，两种错误倾向都很突出。

“一概排斥”论的代表是不承认国外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拒绝吸收其有用的东西。有人说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正确，其实既不客观也不科学。邓小平在 1979 年代表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讲到坚持社会主义时说，坚持社会主义并不只是中国的必须，“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①。那时就提出要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则必须要研究和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介绍、研究就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詹姆逊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发生社会制度的变更之时，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困难的，但是他说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阐释立场。我读后十分感动。在苏东巨变以后，世界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攻击诋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言论比比皆是。但是，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上看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执着的坚守，也增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库”使用 42 种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但是它是第四国际办的，主要宣扬托洛斯基的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能完全赞同的。但该学派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贡献，他在 1972 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中，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比较透彻地分析了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特征，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整体发展有很大影响。美国的詹姆逊根据他的理论，研究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问题，写下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部著作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名著。习近平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65 页。

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① 故即使是结论不准确，但是只要有一定长处，都可以借鉴其有用之处，不能一概排斥。

应该注意的是，习近平讲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思潮”的界定。我的理解是“思潮”这一总称，不仅概括了它有各种流派的情况，而且指出这一思潮的复杂性。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呈现来看，有许多人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具体情况又的确很复杂。有些人的理论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一些人在某些文章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却在另一些文章中放弃或疏远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的某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有一些观点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笔者的理解是，这些不同表现都反映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复杂性的特点。因此，从总体上讲，只要某些人、某一篇文章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都可以肯定，不能因为这些人的另一些文章违背马克思主义就对他或他们进行全盘否定。当然，对这些人、这些文章也不能全盘照搬，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笔者赞成不要简单地宣布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而要在具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上分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是非。照笔者的理解，这就是不要一概排斥的含义。

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全盘照搬”论。这就是刚才讲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讲的不一定全部都正确，一本书里有些内容讲得很好，有一些观点就不一定正确，不能全盘照搬。而且，还有国情的区别。我们应该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不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与分析不加鉴别地照搬和推行到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来。

比如德勒兹 1990 年与奈格里谈话中说：“我认为伽塔里和我，我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围绕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来展开讨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般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仍然是今天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但是在历经了 20 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语言论转向、文化转向和精神分析转向之后，他们逐渐疏离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不同的流派和个人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比较普遍存在 3 个问题：一是不讲人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需要，而只讲人在生存过程中的欲望，人从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变成了当代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左翼文化中的欲望主体，把社会的人变成了自然的纯然生物学的人。二是把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划分作为一个文本式的隐喻，不讲意识形态，而只讲权力话语，背离社会存在和制约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否定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流是书斋、学院、文本式的马克思主义，脱离革命政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他们的“革命的主题不再存在于对劳动和社会矛盾的分析当中，它被驱逐到了道德、艺术、文学和哲学当中，更多的具有修辞学的意义，而非政治意义”^①。这样他们不讲科学社会主义，而大谈乌托邦。而这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以及其他类似问题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背离的，是不能全盘照搬的，是需要分析、批判的。

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优点仍然是认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倡导社会革命和重建历史的基本主题，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思想理论上把文化理论与政治哲学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及本质进行具有认知性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有力批判。习近平指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② 这些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切实将之运用到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中去。

新时代的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要适应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要逐渐走向世界及其中心位置，必须要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习和研究，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专家的交流与合作。

四川大学文艺学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率先介入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这得力于四川大学文艺学学科长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始终如一的坚持的学术传统。1978年笔者就读四川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时，我们的导师唐正序、王克华、王世德、吴蓉章等就指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著作，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文学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五年来，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

^① 伊莎贝尔·伽霍尔：《德勒兹、马克思与革命：如何理解“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内涵》，夏莹编译，见张永清、陈奇佳主编：《当代批评理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

^②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今后，我们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习与研究中，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继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要有自己的新的思想和观点，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继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个全新的视野就包括充分认识目前还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学习和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应当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新变化新特征的揭示与批判。笔者和几位朋友在2014年第2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了几篇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章，笔者在卷首语中说：“西马所有理论模式的设立，大概有几个主要逻辑网节点，一是不能脱离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尽可能发掘马克思理论遗产中过去被遮蔽的东西，二是正视当代现实社会、文化和艺术发展演变的新的事实，三是不能脱离西方社会整体文化语境，尽量吸取当时文化主流意识、观念以及理论、方法中可以借鉴的东西。正是对这几个因素的完整把握以及同左翼思想文化的某种整合，使西马文论进行着一次又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而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三个方面的特点都应该用不能“一概排斥”，同时又不能“全盘照搬”的原则去分析研究。笔者认为，今天在新时代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借鉴，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一个是文化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的新的定义，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式，适应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商品化、社会化、普泛化的发展趋势。虽然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所已经关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遍布欧美，散布全球。中国学者已经对文化研究有过大量研究，但总的说来，缺乏有分析、有鉴别的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定义挑战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构成，前者第一性，后者第二性的经典论述。这里面有一个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之间关系的深层次问题。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主次有别的社会结构合为一体，模糊了二者的差别。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也可能是我们对威廉斯文化理论不能全盘肯定的地方。但是他把二者结合起来也确实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发展的某些特征。这就是 20 世纪文化产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出现，而今逐渐向全球其他国家漫延，成为全球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景观。文化产业用当代社会生产形态变化的事实，把原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纳入了经济活动领域，使之进入经济基础范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已经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统一于文化的范畴之中。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文化产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具有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性矛盾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我们的文化产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不能变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

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基础作为社会的基本支撑，从中寻找社会人的阶级差异。在阶级社会中进行经济分析，这个方法并没有什么错误。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注重对人的文化身份进行多方面的政治分析，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作为身份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和组织分类的单一维度，辨析在当代社会中主体具有种族、性别、代际、机构内位置、地缘政治场域、性倾向等诸多种类的多种地位，把人在生存处境中栖居的空间地带较为广泛地打开。尽管阶级作为人的社会性差异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并不是差异中的唯一的因素，人类主体的社会存在结构具有多层次的层级和叠加因素，即使是阶级这样重要的因素也存在位移的变化。文化研究并没有消除阶级因素，而是在主体多层次差异、重叠、位移等主体结构中研究人的复合型社会位置对具体的个体主体构建的作用，这实际上把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和人的决定性制约扩展到人的实际社会存在的复杂关系之中，这有利于重新认识和界定当代世界社会结构，包容社会差异，打破和消除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呼吁公平、正义，用协商而不是对抗正确处置交互性的主体经验和社会群体价值的矛盾和差异，在国内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合作，在国际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不同文化与文明中开展竞争性协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空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① 人民是一个包括全体国民的全称概念，我们目前在社会学研究中还没有比较清晰的国民个人归属的社会层次的分析，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身份认同的某些成果，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人民主体的多层次的审美诉求，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5 日。

另一个是语言学、符号学和话语理论问题。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语言学转折,语言学、符号学成为重要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它们比传统的逻辑、哲学方法少一些理性思辨思维推导,但多了一些客观、清晰的意义辨析。任何文化和文化产品都是用媒介和符号呈现的意义形态,分析符号呈现的内在矛盾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常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拉康用语言学重新解释了弗洛伊德,使得精神分析学说和一些后现代理论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引发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新的认识 and 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在语言学转向以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精神分析转向的趋势,对此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符号学在传达交流过程中的编码解码理论比较广泛地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运用而取代了单纯分析社会矛盾的社会学方法。德勒兹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建立都是编码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富有流动性的解码。而且,由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发展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路线,苏联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在运用符号学解析当代社会状况、阐释美学与文论重要问题方面有诸多贡献。在语言学、符号学研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献没有被系统整理和研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着对符号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何对接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一重要问题缺乏分析、鉴别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①当前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主要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有比较成熟的话语理论,对多层次的主体间性的对话机制有许多分析,对此学者可以有分析地借鉴。

再次,批判理论的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是由柯尔施、卢卡奇开创、经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发明了“批判理论”这一术语。它的特点就是习近平说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②。正是因为有对资本主义毫不妥协的颠覆性批判的批判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批判理论认识到,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改变,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已开始形成一些应对机制,这使它能防止这些突发的周期性危机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酿成总体性的社会危机。在此情况下，必须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方法以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准确地批判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结构、组织、运行和结果进行批判性审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异化正是人们不能正视和看到自己受到奴役和压迫的实质。批判理论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方法是坚持和扩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相结合的内涵，强调启蒙主义关于人类正义与自由的话语作为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新情况，探索在现时代人的自由解放的新的可能性。这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探究过的问题，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延续下来，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一直顽强地坚持着这些论题并且围绕着它们进行了丰富的系统反思。批判理论对于清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雾，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重大意义。批判理论在美学与文论中主张美学人道主义，后现代思潮解构了人道主义，使许多人觉得再提人道主义没有时代感。其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人道主义讨论中，胡乔木讲的划清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与道德观的界限的论述是很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24 个字中的 14 个字，“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友善”，其内在的核心道德就是人道主义道德原则。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在反思、批判文革极左思潮时呼唤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成为当时文艺作品的一种内在核心价值，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笔者个人的看法是，当前中国文艺作品的普遍问题是缺少美学人道主义的艺术魅力，缺少人文关怀。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流是坚持美学人道主义，值得有分析地借鉴，这对于中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有重要意义。而且，批判理论具有多学科特性，这对于拓展中国当代文论的学科视野，吸取多学科丰富资源，推进建设多学科融合的当代中国文论有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